

溯源与传承——

云大社会学系档案中的学脉与学人

刘兴旺

通常而言,社会学知识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实际上,社会学的知识范围甚广,社会学系档案也为一种类型的社会学知识。马雪峰与丁靖编著的:《魁阁及云大社会学系档案:1938—1954》(2024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档案》),为1938—1954年云南大学(以下统称“云大”)社会学系建立与发展的原始档案。此档案著作主要涵括云大社会学系的建设与调整、教职员情况以及学生培养三个方面的内容,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云大社会学系的建设与调整

云大社会学系的建立过程可谓波折。1939年5月8日,在吴文藻的筹划下,委请时任云大校长熊庆来托人致函教育部,以“促进实地社会研究与训练社会服务人才,以应地方需要”为目的,原定于1939年8月起,在云大添设社会人类学系。遗憾的是,1939年5月26日,教育部函复:因经费有限等因,此次函请未能获批。1939年6月19日,熊庆来再次致函教育部,请求于1939年8月起,在云大设立社会学系,以注重调查研究云南社会的实际问题,并训练服务社会的人才。幸运的是,1939年7月1日,教育部函复:“既经该校陈述筹备经过,应予照准。”1939年8月,云大正式成立社会学系。

云大社会学系的建设成效显著。云大社会学系建立后,除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发的社会学系课程纲要开展教学外,在吴文藻的主持下,也与燕京大学合作,在云大社会学系附设“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又称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末,吴文藻从云大离职后,社会学系成员由费孝通负责。除费孝通外,研究室的主要成员还有张之毅、李有义、史国衡、田汝康等。社会学研究室成员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针对云南实际社会情况展开调查研究。1940—1946年,社会学研究室成员以云南的内地乡村、新工业以及边境乡村为研究对象,向学术界贡献了一批至今璀璨的学术成果。

如费孝通与张之毅对云南禄丰、易门、玉溪的三个内地村子进行实地调查,最终完成《禄村农田》(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张之毅)与《玉村农业和商业》(张之毅)三份实地调查报告,这三份调查报告后被费孝通合著为《云南三村》。又如李有义对云南路南县(今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尾则村进行田野调查,并著成《汉彝杂区经济》一书。再如史国衡、田汝康分别对昆明中央电厂、云南纺纱厂开展实地研究,完成著作《昆厂劳工》(史国衡)与论文《内地女工》(田汝康)。如和田汝康对芒市那目村开展实地调查,著成《摆夷的摆》一书(如今的书名为《芒市边民的摆》)。社会学研究室的有

关成员,以云南的内地或边境乡村、新工业为实地研究对象的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至今在中国甚至海外社会学界璀璨夺目,彰显了云大社会学系显著的建设成效。

云大社会学系在院系调整的浪潮中暂时退场。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捷也夫介绍了用以指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苏联经验。阿氏认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在社会主义社会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原计划于1950年秋推行的院系调整,因大多数高校教师的反对,而推迟至1951年9月才得以按计划推行。截至1952年,全国几乎所有高校的社会学系均被取消。仅有云大社会学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直至1954年才得以分流与调整。1954年2月10日,云大发布《社会学系调整办法》。根据此办法,云大社会学系的民族组归并入云大历史系,云大社会学系的劳动组并入云大经济系。如此,云大社会学系民族、劳动两组共计8名教师与46名学生(三、四年级),得以调整与分流,云大社会学系暂时被取消。

教职员情况

教职员的人事变动。《档案》共列举了云大社会学系及与之相关的共计53名教职人员的人事档案。如云大社会学系的主要创建者、首任系主任吴文藻,于1938年8月偕同眷属及学生从云南河口入滇,前来云大入职。1938年7月30日,云大专为此事致函云南河口督办公署,请求河口督办公署为吴氏等人入境时提供便利。1940年,吴氏假假,随后从云大离职,其社会学系主任一职暂由陶云逵代替。又如院系调整时云大社会学系主任杨恕,杨氏为孙本文向熊庆来推荐的教授。1948年,杨氏及夫人张若名均被云大法学院聘为教授。除吴文藻、杨恕外,《档案》也列举了李有义、费孝通、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与林耀华等人的人事变动情况。

教职员的收入状况。但凡被云大社会学系聘请的教职员,在其各自的聘书中均会注明月薪。日后如有职务、职称与人事变动,云大有关部门会及时发调薪或停薪函。此处以费孝通的新薪金变动状况为例,详细述之。费氏于1939年1月入职云大,8月起被云大社会学系聘为副教授,其月薪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每月由庚庚款补助国币160元;其二,云大每月支付国币74元,从社会学系常年经费中抵扣。1940年9月,费氏被云大社会学系改聘为教授,月薪照旧。1943—1945年,费氏被云大聘为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月薪国币550元。自1945年8月起,费氏又被云大聘为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其月薪有所调整,领取兼任人

员的薪金,“除部里四小时之正薪及加贴类外,每月致送特别办公费国币三千元,研究指导费国币贰万元(特别费用),膳食补助国币壹万元。”此待遇截至1946年7月费氏从云大离职。

教职员的实地研究与学术交流。云大社会学系的教职员前往云南农村、昆明的工厂等地开展实地研究时,云大均会提前向云南省教育厅、调研沿途单位以及田野点所在县政府发送公函,请求为调研教职员提供便利,保护其人身安全。如费孝通与李有义前往禄丰县(现为禄丰市)大北厂村开展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前,云大先致函云南省教育厅,请求省厅向禄丰县政府致函,为费孝通与李有义提供调查便利与人身安全保护。此外,云大也致函西南运输处,请求减免免费、李两人调研途中的车费。他们完成调研后,在乘汽车回昆明的途中携带一支自卫的小枪,最终枪被云南汽车西站检查处扣留。云大又为归还枪支一事,致函云南汽车西站检查处。

《档案》也列举了云大社会学系教职员因外出学术交流,发给相关单位或个人的函件。以李有义外出交流为例,1941年暑假,李氏参加边疆服务团,自成都返昆明的旅费,教育部蒙藏高等教育司补助了国币300元,尚差国币580元。为此,教育部蒙藏高等教育司致函云大,希望学校酌量补助缺额。

学生培养

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课程设置。云大社会学专业实行四年学制,所开课程以专业理论课为主,也有实务课程《社会机关参观》,以及诸如《党义》《体育》《军训》等必修公共科目。专业课涵盖《社会学》《社区研究》《民族学》《社会统计》《中国社会史》《家族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等。云大社会学系许多专业课的授课方式在当时乃至现在,均可称得上新颖。如吴文藻所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吴氏采取自己演讲两小时,学生分小组讨论一小时的授课方式;实行学识导师制,并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以训练其理论思维;部分学生深入机关参观以增

进其对现实社会的了解。此外,李有义开设《社会机关参观》课程,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李氏先后带领学生前往昆明市政府、云南省财政厅与云南日报社等机关参观。

注重培养学生开展实地社会调查的能力。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还应具备开展实地社会调查的能力。云大社会学系为提高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能力,以学生独自或教师带队的方式,让在读学生前往云南多个乡村开展田野调查。如游钜颐受费孝通之命,于1945年寒、暑假前往路南县(今石林彝族自治县)开展田野调查。又如1948年刘尧汉带领詹开龙等7名学生,前往昆明大麻苴村(现隶属昆明市官渡区阿拉乡)开展调查等等。

社会学系档案的价值

表征了一种类型的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为社会学约定俗成的知识,但并不意味着是仅有的知识。知识社会学强调挖掘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与历史情境,诚然,这一做法已将社会与历史情境视为一种类型的知识。而社会学系档案深度还原了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与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系档案表征了一种社会学知识。

延展了中国社会史史的研究图景。以往的中国社会史书写范式,主要包括人物式、学派式、年鉴式、复合式与命题式。1952年院系调整时,全国高校至少设立了19个社会学系。然而,《档案》确为至今唯一的、有关云大社会学系的原始档案著作。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者以院系调整前各高校的社会学系档案为中心,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史学。此举可为中国社会史学研究增添一个社会学系档案范式。倘若如此,《档案》已在这条新范式形成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作者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文献剧“费孝通的魁阁时代”在昆明演出。本报记者 王毅 摄

《开化府志》:一部记录清代改土设流的地方志

冉庚文 高珊

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两个版本的《开化府志》,两个版本体例一致,上限一致,都是自远古的“颛顼帝”起;志鉴一致,是一部记录清代改土设流的地方志。

《开化府志》的特点

特点一:记述的历史跨度长、编修时间长,参与编修的人员众多,多数成果被公开出版发行的多个权威方志引述或收录。先后主持编修工作的汤大宾、周炳两位知府、两任总裁的贡献最大。汤大宾,清代江苏省常州府清阳湖人。历任玉环同知、山阴知县、云南澄江知府、开化府知府、广西潯州知府兼梧州知府等。1758年主持编修并成书《开化府志》。至1825年,周炳等人再次主持编修《开化府志》时,汤大宾被载入“名宦”。周炳,铁岭人。1816至1828年,周炳在云南开化府境内履职达10年之久。自1825年起,因云南纂修省志,周炳受命参与开化知府何怀道等人续修《开化府志》。1829年,周炳升任安徽池州知府,在奔赴安徽履新途中,周炳将志稿带至昆明省城交给负责云南省志总纂的毕沅守备书、山阴县史澹初2人作精审删定,然后进行刊刻印刷。

特点二:“改土设流”主线贯穿全志。汤大宾、周炳等诸人志“山川”而述之:“百年以来,山无伏莽,河不竭流;志“学校”而述之:“庠序立而礼乐兴,诗书泽而风俗美”……全书共计10志,均以“改土设流”为主线,彰明政道,鼓舞士气、濡润后生。这样的写法,打破了“志不间政”的私人修志法则,立起了中国官修志书与国之大政互为表里的一面旗帜。

特点三:志专加附志,互为印证。周炳道光志的篇目体例与汤大宾乾隆志是一致的。全书10个大的部类,部下设67个子目,为25万余字。67个子目中,均有

不同的附志,每个附志之下又有二三个、四五个不等子目。志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主次分明、轻重相宜、互为表里、互为支撑,全书10志都采用了类似的组织形式,这是《开化府志》的一个特例。这样的布局和写法使改土设流各方面的重大成就都得到了应有的记录。

《开化府志》关于地理、历史、文化及人物研究

《开化府志》第一卷“图象”、第二卷“建置”、第三卷“山川”通过对地理的记述,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到在改土设流进程中,处理好民族关系、边界关系,处理好大小国小国友好交往、和平共处的中国智慧和云南开化各民族的历史贡献。

关于开化的历史研究,在第二卷“建置”中的“沿革”和第八卷“兵防”有详细记述,在这些记述中,可以让广大读者、读者了解到“诸葛亮平定南中”“中国与藩属国安南”等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历史经纬。

关于人物研究,包括“选举”等16个子目,是《开化府志》中子目最多的一个专志,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男女,只要在某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都进入志书,与其他人志人物相比,进入志书的女性占有一定的分量,进入志书的妇女均是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老爱亲且献出青春,甚至宝贵生命的时代典范。

关于文化的研究,或“木杆金羊,西南呈经纬之象;白鸟神马,邀傲开文学之先”的开化育人之气,或“易朴邀而彬雅,浸淫乎鼓吹休明”之开化风俗之美,或“太平盛世”“鸿业鸿彰”的开化文明之风,均坚持“按地稽籍,必有实据;表里分析,不厌精详”原则,集中在“学校”“风俗”“艺文”中作真实记述,以此彰显改土设流“文以载道”的文山图景。

《开化府志》的治疆文化理念

《开化府志》倡导的治疆文化理念,值得广大学人倍加重视与传承。

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理念。改土设流以后,中央王朝设立“有开必先、有初必继”的开化府。1730年设立由雍正皇帝钦定实命的“笃实者山,辉光者文”的“文山”县治。以图实现“火法土凝”“日华岳曜”“日新其德”的全新改变。这些首善梦想,早在1731年就写入云南文山首任知县徐本仙的《修建文山书院记》。至汤大宾编修《开化府志》的近百年时间,开化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兴办了教育,产生了土司时代闻所未闻的进士、举人若干,以及从开化地区、文山地区生长起来的异地为官的知府、知县、教授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理念。知府的职能职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劝农课桑,以厚风俗;禁戢强暴,以安良善;平情听断,以清狱讼。”这些标准写入了大清王朝《训仿知府文》。知府履新前,都要接受皇上见面训词,“设郡以来,屢被殊恩:减赋粮、均徭役、免商税、重赏恤。”知府汤大宾在“田赋”小序中引用了《尚书》的“亲民爱民”语,体现了那时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九围一家、六合同风理念。改土设流,其目的就是要革除四分五裂的民族割据局面,最终形成各民族大联合大团结大一统的人类文明新格局。诸如“我家家道,区宇九围久式”“今圣天子在上,中外一统,重译来朝”之说,在《开化府志》中多处可见。“伦明于上,民亲于下”“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咸知展亲睦族,讲让兴仁,以臻一道同风之盛。”知府汤大宾在《改建开化府明伦堂碑记》中如是说。开化人、文山人,以开辟学校、拓展教

育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改土设流以期实现大一统的变革理念。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理念。尊重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传承“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的“信立威成”之中国大道,反对穷兵黩武。汤大宾在宣扬这些理念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以文教治郡”的边疆治理新理念,并付诸实践。社会文明蒸蒸日上,四方百姓纷纷叫好,当时开化邻国藩属国王更是表示“圣朝千万年大寿,因国千万年奉贡”。治疆知府汤大宾因此享有一代“名宦”的崇高荣誉。

潜移默化、因势利导理念。改土设流的又一个举措就是把原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保留下来,把优秀的外来文化融入地方文化,改进或革除不良之风气。于是开化地区才有“正月初一过大年”“正月十五闹元宵”“二月初三祭文昌”等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民族文化节日。“俾之潜移默化而默喻,则又在平振兴鼓舞,因其势而利导之。”汤大宾在《开化府志》中说,对于那些没有进过学校的大多数人,要多从正面引导,要使那些低级的文化、庸俗的文化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正所谓“庸多让乎!”所以“志《风俗》!”

云南巡抚刘藻说:“俾千百年方隅事迹,原委条贯。瞭然在目”;云南学政叶观国说:“观其纲举目张,不支不漏,其力可调动、其功可谓伟矣。”云南布政使傅靖说:“洵有合于外史之遗意,而足以导扬美盛,昭国家一统无外之鸿模矣。”“考据综核,叙次井然。”云南粮储道罗源浩说,《开化府志》篇目的完整性,常嫌《南中志》及西南所有史书、志书与其相比,是“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

(作者1系中共文山市委党校三级调研员;作者2系中共文山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云南媒体国际交往的探索与构建

——《为了“心联通”:媒体国际交往的云南实践》评介

吴莹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南亚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是“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重要力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单边霸凌、保护主义逆流,面临“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加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构建更有力量的国际传播体系,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了“心联通”:媒体国际交往的云南实践》一书立足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具体实践,充分发挥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前沿优势,全方位运作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积极构建媒体国际交往平台,讲好云南故事和中国故事的具体实践,生动阐述了在推进中国重大外交的舞台上,媒体国际交往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

系统诠释了媒体国际交往“何以必要”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和国际传播工作,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承担“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重要职责使命,强调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围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更有力量的国际传播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国际交往依托媒体机构发挥信息纽带和桥梁纽带功能,在开展国际传播促进民心相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云南区位优势明显,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枢纽,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重要门户。2022年5月31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正式成立,展开了一系列对外媒体外交平台国际传播的生动实践,《为了“心联通”:媒体国际交往的云南实践》一书详尽阐述了这一历程,呈现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表达,用好“亲诚惠容”多层次朋友圈的新方式,探寻数智时代赋能国际传播的新支撑,既从理论层面清晰梳理了媒体国际交往的相关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功能作用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又从实践层面充分展现了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借助媒体国际交往发挥媒体外交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已经成为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软实力”和“暖实力”的重要支撑。

生动阐述了媒体国际交往“何以呈现”

媒体国际交往作为媒体外交的重要形态,是一项重要的外交实践活动。《为了“心联通”:媒体国际交往的云南实践》一书对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这一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全方位展现媒体国际交往的地方实践价值。该书以“象符号”Logo形象概括了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理念及使命。大象是东南亚国家和云南的共同文化形象,代表着智慧、力量和友好,能够较好地引起区域文化共鸣。“象符号”就是两头大象彼此靠近,鼻子紧紧相连,形成一种互动的姿态,象征着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鲜明表达了作为云南国际传播旗舰的新平台,是对内统筹和对外联动的“桥梁”和“纽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国际舆论场上,谁拥有平台,谁就拥有话语权。平台媒体矩阵是开展媒体国际交往的核心支柱。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坚持机构实体化、一盘棋运作,通过上下“联”、任务

“联”、资源“联”、学习“联”、效果“联”等方式,对外构建“地方—央媒”“地方—地方”“地方—周边国家”的国际传播合作平台,对内构建四份外宣期刊+《中国·云南》新闻专刊+云桥网+海外新媒体的全媒体、多平台国际传播矩阵。在这一书中详细讲述了各种“联”背后的故事,比如,建立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吸纳国内外主流媒体、相关机构、个人博主等多方主体,共同生产融媒体产品。同时成立南亚东南亚记者之家,积极探索地方媒体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途径,促进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互学互鉴、互动互信、互帮互助。

面对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话语场域的深刻变革,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把中华文化、中国故事与中国受众的文化传统、接受习惯等结合起来,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该书展现了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如何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和优势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比如,该中心围绕在命运与中共讲好“云南味”中国故事,以国际关注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为叙事轴线,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共二十大等重要介绍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聚焦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等主题,兼具深度与温度采访报道,增强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发挥地方优势,推动主流媒体跨区域联动,以中老铁路、飞虎队等选题创新叙事,增进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民心相通和情感共鸣;在新技术的赋能下,以更具有人文色彩和生活气息的表达,巧妙实践了国际传播与媒体国际交往的深度融合。

鲜明回答了媒体国际交往“何以深化”

伴随媒体环境和舆论生态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主流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深水区”,新媒体平台、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然成为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新战场。如何乘势而上,通过拓展媒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智能化布局等方式主动塑造传媒生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是一道更好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必答题”。《为了“心联通”:媒体国际交往的云南实践》在实践中深化认识、从实践中思考问题,于实践中明晰答案。

传播方式方面,提出为“亲诚惠容”建立多层次朋友圈。2025年4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承,在媒体国际交往中用好加法,打造双边媒体合作品牌,发挥“媒体+”的叠加优势;学会借力,围绕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打造“一条江、一家亲”活动品牌,提升新闻机构影响力;注重共情,创新体育活动的“低语境”传播,突出“跨国春晚”等具象化符号,让传播更容易引发共鸣;突出青年,举办Z世代+社交媒体、Z世代+人文交流、Z世代传播培训,呈现心心相印、美美与共、互学互鉴的传播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别出心裁地创设“云南海外传播官”,借助外脑、外眼、外力助力跨文化传播更加可亲可信。

传播支撑方面,提出用数智技术赋能媒体国际交往。通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AI)、虚拟数字人和小语种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新技术,立足自身在内容生产、融合传播、触达渠道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不断创新新媒体国际交往的载体和形式,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和传播效果。比如,组建云南省媒体融合重点实验室,突破面向南亚东南亚语言媒体内容生成、影响力分析、用户画像及内容推荐等关键技术,搭建多语言生产、图文视频等多媒体呈现、网微端多渠道发布的媒体内容生产平台,实现了对外传播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智能化和集约化。当虚拟数字人让媒体传播提升颜值、自然语言处理让跨文化交流畅通无阻、数字艺术交流催生新“思路文化”,媒体国际交往的亲力和实效性与之俱增。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